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 国际关系学

## 理论与实践

郭学堂 主编

时事出版社

# 国际关系学

## ——理论与实践

郭学堂 主编

时事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关系学：理论与实践/郭学堂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04

ISBN 7 - 80009 - 820 - 6

I. 国… II. 郭… III. 国际关系学—研究  
IV.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1092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spublish.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

开本：880 × 1230 1/32 印张：15 字数：36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 序

2003 年春天，几位我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与我商量，希望结合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出版一本论文集，借助这一形式，探索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特点。他们很快行动起来，现在，论文集——《国际关系学：理论与实践》最终面世了。

长期以来，由于客观原因，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较多集中在政策分析和形势描述两个层次上，而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则往往被人忽视。表面上看，这种研究层次的分布格局侧重现实性和服务性，无伤中国国际关系学建设的大碍，实则不然。

作为一门完整的社会科学学科，国际关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都离不开理论基础的有力支撑。国际关系学中的基础理论层次和应用理论层次发展不起来，政策分析的力度和准确性就要大打折扣，而形势描述层次的研究所提供的原始信息也将得不到系统的疏理和高效的利用。因此，一个国际关系学者，必须具备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两方面的过硬素质。

就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而言，一国的学科建



设少不了在基础概念、基础范式、基础流派方面狠下功夫。鉴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目前引介、消化和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我们自然不能摒弃现实不管，闭门造车，构建封闭的基础理论体系。

目前，要缩小与西方国际关系学在基础理论上的差距，惟有按照“拿来主义”的原则，大胆、充分和毫无成见地打开门户，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同时摒弃和批驳属于糟粕范畴的东西。

介于基础理论与政策分析之间的应用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的枢纽。它起着联系基础理论与政策分析，把基础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价值的桥梁作用。一般来说，国际关系应用理论是与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法、国际制度、国际关系史和对外政策等国际关系学的六大分支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应用理论是整个国际关系学的难点所在，它意味着基础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完美结合。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现状来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理论底座，尽管中国学者学以致用意识十分强烈，但应用理论仍然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快速的发展。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进入了重要发展时期，各种类别的国际关系学专著、译著等层出不穷，大有铺天盖地之势。显然，随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和中国全面融入世界体系，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逐渐摆脱了“背景+过程+展望=国际问题研究”的研究公式，不断探索使用新



的理论方法，科学地研究、预测国际新形势和中国的外部环境。同时，关于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并开始了有步骤的研究和探索。由青年学者郭学堂主编的《国际关系学：理论与实践》一书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国际关系学：理论与实践》一书汇集了26位青年学者撰写的25篇研究论文，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重点，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中国特色。他们不仅非常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还特别关注应用研究。比如，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霸权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表现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直接影响到国际关系格局的走向和国际安全的未来，有鉴于此，曹泳鑫、郭学堂、严峰和蔡志强试图从理论上梳理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与霸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大国兴衰对中国崛起的意义；陈东晓、潘忠岐、忻华则从美国霸权特征和内容方面探讨其未来走向。蔡翠红、张贵洪、王义桅、王传兴、钟振明、卢光盛、赵可金在研究和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评论和研究视角多种多样，审视态度更加客观，说明中国青年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逐渐成熟。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如何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话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观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泉，郭树勇、陈剑峰结合中国的“和合文化”，试图挖掘建立国际政治秩序的新模式；许嘉提出中国需要



以东西方战略文化和思想为基础，建立与中国国力相匹配的战略研究体系和相关的理论体系；余建军则着重分析了中国的身份观和利益观，从一定程度上阐述了中国的外交取向。

中国学者关心的另一个重点是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外部安全环境。在这本论文集中，金安、成帅华、章节根、吴苑思就如何看待欧盟的合作霸权体系、如何评估欧盟东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分析日本的不扩散政策和如何理解东亚地区的地区主义分别做了研究，其中不乏独到的观点和研究思路。中美关系是中国学者在对外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我们需要在历史长河中研究它，要抓住核心问题研究它，还要透过美国国内政治研究它。潘锐、信强、邵育群、王珏分别就台湾问题的历史、美国国会在经贸关系和台湾问题中的作用以及反恐合作问题做了深入研究。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需要理论和应用、历史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的综合研究，这本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已毕业的博士或在读博士合作出版的论文集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纵览全书，我们不难发现新世纪的青年学者的研究有着三个方面的共同特点：

一是他们的研究始终把重点放在国际关系学的核心理论——权力观和利益观上。他们根据不同学派，从不同角度剖析权力观和利益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运用、发展和作用。



二是他们的研究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要知道，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现实分析，都不可能脱离世情和国情。脱离实际的研究不会被人接受，因此也就不会有活力，也就不会有生命力。这本论文集集中就有许多理论亮点，而且具有应用价值。

三是他们的研究非常有时代感和使命感，非常关注中国和世界的未来。没有国籍的学者是不存在的，没有个性的研究也是不存在的。只有将自己的研究与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国家紧密结合，才会更有价值和意义。

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国年轻一代的国际关系学学者大有潜力可挖，在“后浪”的大力支持下，他们是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的。

是为序。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倪世雄

2004年5月



## 前 言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提高和对外交往的增多，中国的对外关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积极的变化，独立自主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在保证和平的外部环境方面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给 21 世纪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提出了许多严峻的挑战，国际关系自冷战结束以来更趋复杂，国家之间的竞争趋于激烈，竞争的内容越来越广泛，竞争的方式也趋于多样化。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国情和世情的客观要求，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长时期脱节是这一研究难以取得根本性进展的“瓶颈”。新世纪的对外关系实践呼唤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理论发展和创新。如何与时俱进，立足现实，立足当代，以“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突破口，实现国际关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已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

国际关系学不同于国际关系历史学、国际政治学、国际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外交学等分支学科，它“是从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现状研究中分离出来的。”<sup>①</sup>它以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为着眼点，重点研究其各种国际行为体内部、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格局之间的各种联系，寻找推动和制约国际关系格局形成、运动和演变的内在规律。

国际关系学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逐步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国际关系学主要表现为对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它以国家行为体为研究对象，结合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对传统安全因素、内容和表现形式进行分析，并以此寻找保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内在规律。在冷战后期，高新技术革命带动了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不断出现，有的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此背景下，国家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在安全上相互需要，在政治上相互合作。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大，它不仅需要研究国家行为体内部和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关系，而且需要研究非国家行为体、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各种关系，更为

---

<sup>①</sup> 张季良主编：《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3版，第9页。



重要的是，研究这些行为体和交叉关系与国际关系格局之间的联系。

国际关系学主要包括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二是国际关系理论。前者要求国际关系学研究具有历史感，更加强调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演变和继承性；后者则要求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专业化和系统化，更加强调行为体内部及其相互关系的全局性影响和结果。

## 二

自新中国成立 55 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历经多次国际关系格局的转变，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也反映出时代特色。<sup>①</sup> 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闹局面，在评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同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国际关系史方面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从目前的研究看，开始出现带有一点学派、流派色彩的作品，有些甚至称得上是中国在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虽然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sup>②</sup>

① 倪世雄等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486—490 页。

② 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成就与缺失的几点感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4 期，第 10 页。



尽管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非常有活力，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我们仍难以否认在理论上存在的“空虚感”，因为我们缺乏一种能够长期指导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也就是说缺乏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性理论和应用性理论。我们面临着的是如何突破研究“瓶颈”的重大问题。

综观 20 多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二十多年来，学术界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译著和研究著作大多属于国际政治理论的范畴，即国际政治学一直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以国家为研究对象、以国家安全为研究内容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点。在多种国际行为体并存和国家安全“国际化”的 21 世纪，我国国际关系学长期存在的研究方式已经不符合当代国情和世情。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非国家行为体不断增多，它们之间、它们与国家行为体之间、它们与国际格局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这要求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必须突破以国际政治理论为研究重点和以传统国家安全为研究内容的研究模式，转变为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地区的研究模式。例如，我们要加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崛起与国际格局、大国兴衰的规律、外交决策等众多符合世情和中国国情的领域的研究。

再者，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受到中国学界的高度重视，它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



研究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受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深，以至于在短期内难以摆脱西方研究逻辑和研究思想的束缚。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很多研究成果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马首是瞻”，似乎越“西方”越是理论研究。王逸舟先生批评得好：“过去虽有理论研究，但研究理论的理论，尤其是研究中国视角的理论非常欠缺。”“现阶段美国的影响太大甚至成为主导性的东西”，“如何超越美国中心”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需要思索和下大气力探索的问题”。<sup>①</sup>

我们不是要否认中国学者在发展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所作出的成就，而是要在发展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使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中国化”，要有中国视角。“坚持批评的态度，才能正确地借鉴。”<sup>②</sup>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而要看到其局限性，同时要吸收西方理论的精华为我所用。

另外，由于研究条件和研究环境的客观限制，一些国际关系学研究成果是在象牙塔中完成的，缺乏实践的检验。学界前辈宦乡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建立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一是为了总结过去的行

---

① 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成就与缺失的几点感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12页。

② 倪世雄等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502页。



为，二是指导将来的行为”。他认为，“我们建立国际关系理论是为实际服务的，是为今天的实际和今后的实际服务的。”<sup>①</sup> 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现实性和时代感，缺乏实践检验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在当前的国际关系学研究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国际关系的T和P（theory and practice，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结合。<sup>②</sup>

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是国际关系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任何一种有深远影响的理论都是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的，也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很大的特殊性，即符合特定国家的实际情况。西方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之所以长久不衰，原因就在于它的实践性和普遍性。这是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总之，我们需要放眼中国与世界，需要有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行动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

### 三

#### 编写《国际关系学：理论与实践》一书的主要目的

---

① 宦乡：《关于建立国际关系学的几个问题》，见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② 倪成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505页。



就是，集合一批青年学者，结合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尝试打破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中出现的“瓶颈”现象。尽管这种尝试还非常肤浅、非常有限，但却是有意识的、有成果的。

本书分为理论篇和实践篇，共收录了26位青年学者撰写的25篇论文。他们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从不同角度对国际关系学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综合性分析，有的论文进一步评述和发展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的论文提出了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和方法，有的论文梳理了当今国际关系格局的特征和未来走向，有的论文则系统分析了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对外关系和安全环境。

曹泳鑫在《国际政治秩序与世界霸权——国家、地区、全球秩序的三重构建》一文中提出，建立公正合理、对世界霸权有制约能力的国际政治秩序，有赖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以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家（关系）秩序、以区域合作为基础的一体化或准一体化地区秩序、以国际组织和世界性机构的治理机制为基础的全球秩序。他认为，中国要坚持一个合作的主权大国形象，积极投入到国际机制和地区组织的创建中，从而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发展进程。

郭学堂在《霸权周期论的贫困——兼析美国霸权是否走向衰落》一文中认为，由于割裂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没有认识到国家安全的联动性，霸权周期论出现了贫困。他认为，大国之间合作大



于冲突、协调多于对抗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安全相互依存不断深化的情况下，避免大国冲突和实现霸权的和平更替是完全可能的。

严峰、蔡志强在读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后颇有感触，他们在《国竞天择·适者生存》读后感中认为，大国兴衰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国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只有不懈努力，壮大自己的力量，才不会被历史淘汰。

蔡翠红的《信息时代国际体系的量子模型近似——兼析几种国际体系范式》一文，无论是视角还是内容都非常独特，作者运用物理学的一些规律来分析国际政治，她认为，在信息时代，国际政治的主体走向了多元化，并因此呈现出几种有代表性的静态理论。同时，她还发现，当前的国际体系就像量子物理学中的原子结构一样。为了更形象化地、动态地描述当今国际政治，她大胆提出使用量子模型理论对国际体系进行动态模拟。

张贵洪在《理解国际安全：理论、战略、政策》一文中认为，安全理论是对安全的深层次认识，是制定安全战略和安全政策的指导；安全战略是一个国家对国家安全的宏观、长远和整体的规划，处于安全理论和安全政策的中间层次；安全政策则是安全理论的一种实践，又是安全战略的具体实施手段。理论、战略和政策，是我们理解和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三个层次和视角。

王义桅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中美之比较》一文，首先提出了评判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层面，即



“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并在此基础上，以中美两国的理论研究为范例，对比分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层面。他认为，二战结束以来，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突出地表现为美国性，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必然具有中国性。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另立门户，提出全新的体系或学说。

王传兴认为，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生活中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它的影响无所不在、经久不息，时刻在指导每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正如作者的论文标题——《无边的现实主义》一样，现实主义“法力无边”。

钟振明在《沃尔特的威胁均衡理论：理论演进、政策意义及其批评》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沃尔特的威胁均衡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是对传统均势理论的一个重要修正，当然，其本身也存在诸多缺陷。作者指出，只有在全面地辨析一种理论的价值和缺陷之后，才有可能对这种理论的研究程序进行更为精细的改进。

卢光盛的《地缘经济学述评》一文讨论的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词语。作者认为，人们对于地缘经济学的理解和认识存在着很多差异和误解，对地缘经济学的定义不仅模糊，而且对其主要观点的归纳也是零散、缺乏系统的。作者在对地缘经济学概念及其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而评述地缘经济学的性质和作用，并对其未来发展做了展望。

赵可金在《公共外交：全球化与外交理念的新发展

